

1

博医会报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中国博医会 编

1887-193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

博医会报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中国博医会 编

1887-193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887-1931)(全四十二册)/中国博医会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13-5127-5

I. ①博… II. ①中… III. ①医学—文集—英文 IV. ①R-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0063号

书 名 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887-1931)(全四十二册)

著 者 中国博医会 编

选题策划 许海燕

责任编辑 许海燕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16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套

书号 ISBN 978-7-5013-5127-5

定价 24000.00元

《博医会报》与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

复旦大学 高晞

《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是一份英文刊物。它是由博医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在华医学传教士学术团体——主持的医学专业刊物,创刊于1887年,上海发行。1907年5月,更名为*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932年,博医会与华人西医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合并,两会刊《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①合二为一,《博医会报》成为《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更名为*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从创办至合并的45年里,该杂志共计出版45卷。

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延续至今,是国内唯一一份横跨三个世纪、在海内外发行的英文学术刊物,创造了中国科技出版史上的奇迹。它忠实地记录中国医学科学的成长历程:中国医学科学化、医学教育职业化和中国公共卫生现代化的历史;它代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博医会报》45年的历史,见证了西医传播由西人主导逐步过渡到中国人自己掌控的艰难的转型历程。汇聚医学传教与医学传播之间因合作与冲突、和谐与分歧而产生的诸种观点和思想、发生的重大事件、出场的关键人物,以及存在过的各式各样解决方案。是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卫生史、生命科学史,乃至中国近代史和社会文化史难以忽视的珍贵史料。

《博医会报》的创刊对中国医学科学的创立与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医学的窗口,亦是中国医学走向世界的大门。它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背景下产生的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缩影。

^① 《中华医学杂志》(ISSN 0376-2491, CN 11-2137/R)创刊于中华医学会成立的1915年。创刊之初是中、英文双语期刊,英文刊名为*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一、释名:《博医会报》与博医会

《博医会报》的存续与博医会的发展轨迹密不可分,《博医会报》的历史由博医会创造,博医会的命运由《博医会报》记录。

若由名称考察,博医会和《博医会报》是与传教密切相关的学会和刊物。1833年7月1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 - 1861)致信美国公理宗海外传教总部(美部会),鉴于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艰难拓展,希望总部能派一名医生来华,“这会极有益于传教事业”^①。这是目前可见提出要求医生来华辅助传教的最早记录,即是在华开展医学传教的思想来源。1834年6月美部会派伯驾(Peter Parker, 1804 - 1888)抵广州,1835年在华商的帮助下设一眼科医局,他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医学传教士^②。1838年2月21日以医学传教士命名的“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在广州成立,这是一个由商人、传教士、医生和医学传教士共同组织的社会团体,有着明确的章程、目的和行动计划^③。研究者指出,“在华医务传道会”目的不单纯是为传教事业开辟道路,而是为全面扩大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而创设的一个带有世俗成分的社会性团体^④。自此,“医学传教士”携着“医学传教”的重要使命赴华开始西医传播工作,“医学传教”(Medical Mission)和“医学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作为专用名词开始频繁出现在近代西文文献中,并因本刊的刊名而发扬光大,但中文术语要到

① “Elijah C. Bridgman to Rufus Anderson”, Canton, July 1st, 1833.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 Unit 3 / ABC 16.3.8, vol. 1. 感谢台湾苏精教授提供此线索和原始文档。

② Irvine Loudon (ed.), *Western Medicin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50; J. C. Thomson, “Rev. Peter Parker, M. D., First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Dr. Kwan A-To, First Chinese Surge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CMMJ)*, Vol. II No. 4 (December 1888), pp. 169 - 173.

③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Regulations and Resolution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 1 (May 1838), pp. 33 - 44.

④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299。

20 世纪之后才显现于史料^①。

1886 年在福州发行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刊载一则国际会议信息,1887 年 5 月第 9 届国际医学大会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会议宗旨是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欧美各国医生在医学科学领域的沟通,分享各自的最新医学成就。第一次充当主办方的美国,希望本届会议一改以往只有欧美医生参会的局面,欢迎世界各地学者与医生加入。但按大会的规则,参会的成员必须由本地区或国家的医学团体派遣^②。《教务杂志》在报道上述信息时,特别强调日本已决定派代表参会,同时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③其实,在华的外国医生,尤其是医学传教士们,以为他们在中国的医疗经验和对疾病的探索,值得展示在科学世界的各国医生面前^④。只是跃跃欲试的医生们,不具备大会所要求的学术资格,他们没有专属的医学团体,当时在华的西医生,或是个人行医,或是分属各传教差会,差会属宗教团体,没有资格派医学传教士为代表去美国参会。美国圣公会医学传教士、上海同仁医院的文恒理医生(Henry W. Boone, 1839 - 1925)正计划于 1887 年春天去美国,但作为医生个人,即使他想参会,也不会被大会接受。为具备派选代表资格,联合在华各差会医学传教士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建议便提上日程^⑤。谁曾料想,华盛顿大会的代表资格之选,竟然开启了医学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新阶段。

其实,历史的偶然往往有其必然的基础。自 1834 年伯驾来华开展医学传教活动,之后 50 年,陆续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们筚路蓝缕,开创一条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的

① *Medical Mission* 有多种译法,“行医传教”或“行医传道”,第 1 期《博医会报》便有这两种说法,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p. 41 - 44。20 世纪后,医学传教成为传教差会的事业部,中文称之为“教会医事”,王吉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有专门的“教会医事报告”。*Medical Missionary* 的译法更多,有“传教医师”、“传教医士”和“医学传教士”。但真正的医学传教士他们只称自己为某传道会医士,同前引。1922 年加拿大圣公会派饶司卫来华,他们夫妇在河南商丘创办圣保罗医院,在他的名片上印着“圣公会医士”。传教医师和医学传教士名称则是别人,研究者对他们的称呼。

②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gres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 No. 9 (September 1886), p. 357.

③ *Ibid.*

④ H. W. Boon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 No. 10 (October 1886), pp. 398 - 399.

⑤ 1886 年 8 月南京的医学传教士比必(R. C. Beebe)致信《教务杂志》,提出建立一个委员会,并推荐三名医学传教士为候选代表赴美参加大会。*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 No. 10 (October 1886), p. 397.

特殊路径。至 1887 年全国计有 164 名医学传教士^①,其中不乏有 20 余年医学传教经验的医生。然而,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有个心结:“在我们 60 余名男女医学传教士中间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交流医学经验和思想的途径,无法分享仅存在于医学传教士之间的共同感受,“当我们想支持那些偏远的同事,向他们输送力量,却没有一个供血的中心”。于是,文恒理呼吁:“让我们组织起来吧。”^②

文恒理提议参考基督新教在华所采取的全国性大会的集聚形式,建立一个合法组织:确定会章,出版刊物,选举主席、副主席、秘书和财务管理,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大会。他确信“当我们将自己当做是有组织的科学团体的一分子时,我们就会为知识世界增添分量”。文恒理提议,1888 年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推荐广东博济医院老牌医学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 1824 - 1901)担任主席^③。行动首先在上海展开,1886 年 10 月 23 日,上海医学传教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初拟了学会规则和章程^④。1887 年 2 月《教务杂志》公布“中国行医传教会”(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成立,基于媒体发布的时间会落后于实际成立的时间,可以断定“中国行医传教会”实际成立时间应当早于 1887 年 2 月 26 日^⑤。该会是由“中国各教会中泰西名医,共计 70 余位,有自英国来者、有自美国来者,有男医、有女医”共同集议创立^⑥。选举广州嘉约翰为会长,天津马根济(John K. Mackenzie, 1850 - 1888)、上海文恒理、武昌狄医生(W. A. Deas)、汕头雷医生(A. Lyall)、福建惠亨通(H. T. Whitney)为副会长,分别负责北方、上海、武昌和汉口、广东、福建和台湾 5 个分会,上海的桂医生(E. M. Griffith)为大会秘书兼财务主管^⑦。推举文恒理、伯驾和马根济三人为代表,赴美参加华盛顿国际医学大会^⑧。这群来自欧美各

① “Medical Missionaries to China”, *The Medical Missionary Recorder* (New York), Vol. II. No. 3 (1887), p. 76.

② H. W. Boon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 No. 10 (October 1886), pp. 398 - 399.

③ Ibid., p. 399.

④ “Medical Societ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 No. 11 (November 1886), p. 442.

⑤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I No. 2 (February 1887), p. 86.

⑥ 中国行医传教会启,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42.

⑦ 原名单中有伯驾和马根济,两人最后未能履职,改为 Dr. D. B. McCartee 和 A. Lyall. “Official Notice”,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31. 不过在第二期正式名单中,马根济仍为中国北区的副会长。“Officer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CMMJ*, Vol. I No. 2 (June 1887).

⑧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I No. 3 (March 1887), p. 113.

国、分属不同差会、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医生,因相同的身份和共同的信念和研究旨趣走到一起,自发地组织起来,创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为的是:

其一,务欲诸医各将平日所阅华人病情暨一切施治之法,普告医会。俾后偶遇对同之症,用药有所折证,以期立起沉痾;其二,务欲将西国医学之精微,疗治之神妙,尽情推阐,揭示华人。俾华人多所歆动,以冀医道通行于通都大邑,下至僻壤遐陬;其三,欲用医道以广传道,去其身病,即以发其信道之心,自能尊奉福音,渐祛心病;其四,欲将中国所有奇难杂症为西人所无者,悉告之现居西国诸医,俾互相参究,得以精益求精,登峰造极。^①

从此,这批 50 年来总是冲在传教战场第一线的医生们,结束了孤军奋战的日子,集聚在行医传教会的旗帜下“报告彼此的工作,商讨共同面临的问题,分享各自的经验”。行医传教会以严格的人会规则,界定会员的资格身份,“凡在医学书院考列前茅,给有执照并前经本公会派至中国之人,无论籍隶何,概许入会”。特别规定人品为入会的首要准则,“倘其品学,同会中有三分之一未能信服,即不得经令人会”^②。医学传教士在中国进入以学术交流为主的全面合作时期。

《庄子》有言:“名者,实之宾也。”中国行医传教会的名称以医学传教为主体,成员也是以医学传教士为核心^③。但这个学术团体却是医学传教士试图从各传教团差会分离出来,组建一个自主、独立而且能得到尊重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共同体,医学学术刊物的创建便是表证。文恒理在倡议建立学会的同时建议创办医学期刊,“一份 40 页的季刊,我们可以讨论如何赢得中国人的尊敬,如何采纳最佳方法传授上帝的知识。我们可以收集各地区同事的工作经验——疾病信息和医疗方法”^④。

实际上,杂志的结构定型时间要早于学会的诞生。1887 年 1 月美监理会医学传教士、苏州博习医院创始人蓝华德(Walter R. Lambuth, 1854 - 1921)报告了传教

① 中国行医传教会启,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42.

② 同上。

③ 中国行医传教会的章程规定,会员分为三级,普通会员(Active Members),只限于在华医学传教士;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s),私人医生;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s),海外的医学传教士。海内外医学传教士是为主要成员。“Constitution and By-laws”,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32.

④ H. W. Boon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 No. 10 (October 1886), p. 399.

士们协商后确立的杂志创建方案:名称为 *The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 规格尺寸依照《中国评论》(*The Chinese Review*) 的形式, 25 至 30 页一期, 一年四期, 会员资费 2 元/年。编辑部分三个部门, 科学部, 负责纯医学和外科学的稿子; 宗教部, 负责医院和诊所中与福音工作相关的内容; 第三个部门负责临床、医学教育等稿件, 以及书评、学会简讯等相关信息。蓝华德强调医学期刊代表了英、美传道会和妇女医学传道会(*The Lady Medical Missionary*) 的利益^①。1887 年 3 月期刊在上海面世^②, 初定为季刊, 1905 年改为双月刊, 1923 年扩大为月刊。正式出版物在名称上与设想的有些许差异, *The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 (传教士医学杂志) 更变为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中国医学传教士杂志), 除了名称顺序发生变化, 还添加“中国”这个专用名词^③。

在期刊上添加“中国”两字, 应当是明确杂志身份的归属地, 为其在海外发行时, 标示与其他相似刊物在空间区域上的区别。因为欧美一些地区的医学传道会都有类似的机关刊物, 名称相近, 如美国医学传教会就有会刊 *The Medical Missionary Recorder*, 向医学传教士提供赴海外传教的服务信息, 内容涉及医学传教士的资格、世界各地医学传教信息、海外传教基础知识问答。该刊物与博医会互通有无, 其中亦有刊载中国医学传教内容, 伯驾和马根济等曾成为该刊的封面标题^④。作为博医会的会刊, 《博医会报》具有相同的特性, 内设有“新闻消息”栏目, 发布学会信息, 刊登各类通知、参会和选举表格、新会员入会、学会换届选举、学会规则和章程修改; 学会年度大会的通知、日程安排, 会议报告和会员的论文; 学会的财务报告等, 一一出现在刊物上。

① “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I No. 1 (January 1887), pp. 33 – 34.

② 《博医会报》实际出版的时间应当晚于 3 月, 因为《教务杂志》4 月号还在预告《博医会报》即将面市, 但杂志第 1 期的时间标志是: 1887 年 3 月第 1 卷第 1 期。

③ 英文名称的更变也有可能是打印错误所致, 在蓝华德致《教务杂志》信件里, 标题为: *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但在正文中介绍名称时, 就变为 *The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 两个单词前后换了位, 原文为: The name of said periodical to be *The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 “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I No. 1 (January 1887), pp. 33 – 34.

④ The Rev. Peter Parker, M. D. (with illustration), *The Medical Missionary Record* (New York), Vol. I No. 3 (July 1886), pp. 55 – 57. 显然, 同期刊物是做了一个中国医学传教的专题, 有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Canton Hospital”, pp. 57 – 59; “China’s Need for Medical Missionaries”, pp. 60 – 61; “The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 at Tientsin (with illustration)”, pp. 64 – 66.

《博医会报》最初是一份“传教”与“科学”相混杂的复合型刊物,但是一份医学类刊物,从20世纪起逐渐过渡至纯专业的学术刊物,成为中国近代医学科学传播的重要媒体。尽管其主旨和内容在20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该刊的整体结构却变化甚少,主题构成为“主题论文”,内容由两部分构成,医学研究和医学传教研究,有“社论”“读者来信”“注释与名词”“问题与解答”“医院报告”“医学进展”“新书推荐”和“学会报告”等栏目。具体而言,内容涉及新疾病探索与治疗、医院结构、手术技术、卫生知识、医学教育与培训、医学术语、医学书籍出版信息;推进医学传教工作方法讨论、传教士健康问题、医学传教士在华贡献及工作讨论。第1卷第1期刊有癌症研究的文章^①。《博医会报》的主要作者和读者均为博医会成员,或是在教会医院工作的医生。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广州嘉约翰、天津马根济、上海卢夫施奈德(Elizabeth Reifsnyder, 1858 - 1922)、上海顾力柯(L. H. Gulick)组成,顾医生为业务经理(Business Manager)。1888年马根济过世后,他的位置由汕头雷医生接替。作者可直接投稿到分布各地的各位编辑手中,订阅则由上海的顾医生负责。1891年起《博医会报》的编辑工作集中在上海,一直只有一位编辑马修斯(Percy Mathew),1894年移至汉口,由霍奇(S. R. Hodge)医生负责,1901年至1903年他出任博医会会长。1905年改为双月刊后,始有两位编辑,资费也上升为3元/年。最初由上海别发印书馆(Kelley & Walsh)出版,1895年第3期起由美国北长老会的美华书馆承印。

作为学术与思想交流的平台,《博医会报》将分散在中国大地上的各国医学传教士凝聚在一起,建立团队精神,在思想交流中达成共识,“因为杂志让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团结”^②。博医会代表获得国际医学大会的认可,《博医会报》之后也被其他一些国家的杂志引用^③。博医会会长多数参与《博医会报》的编辑,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详见下表^④:

① R. A. Jamieson, “Cancer of the Pancreas, not Diagnosed during Life”,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p. 8 - 10.

② H. W. B., “Introductory”, *CMMJ*, Vol. III No. 1 (March 1889), p. 23.

③ Ibid.

④ 此表根据北京大学史如松博士论文:《博医会研究:中国近代西医界职业活动模式的形成》(2010年)所整理的数据编辑而成。

《博医会报》主要撰稿人担任博医会职务一览表

姓 名	撰稿数量	职 务
马士敦(J. P. Maxwell)	33	研究委员会委员
马雅各(J. L. Maxwell)	31	研究委员会委员主任
文恒理(H. W. Boone)		会长(1889 - 1890), 编辑
杰福瑞斯(W. H. Jeffreys)	19	研究委员会委员, 编辑
罗感恩(O. T. Logan)	19	
霍奇(S. R. Hodge)	19	会长(1901 - 1903), 编辑
嘉惠霖(W. W. Cadbury)	18	医学教育理事会
笄达文(C. J. Davenport)	16	会长(1917 - 1920)
高似兰(P. B. Cousland)	16	会长(1910 - 1913), 出版委员会主任, 编辑
惠亨通(H. T. Whitney)	15	会长(1897 - 1899)
满乐道(R. Coltman)	15	同文馆医学教习
普拉莫(W. E. Plummer)	14	
嘉约翰(J. G. Kerr)	13	会长(1887 - 1889), 编辑
马嘉礼(J. H. McCartney)	13	
谭臣(J. C. Thomson)	13	编辑
稻惟德(A. W. Douthwaite)	12	会长(1893 - 1895)
毕比(R. C. Beebe)	12	会长(1899 - 1901)
伊博恩(B. E. Read)	11	协和医院教授
阁司督(D. Christie)	10	会长(1905 - 1907)
布施(R. T. Booth)	10	研究委员会委员
怀教幹(D. Whyte)	10	研究委员会委员

尽管刊物发行至日本、朝鲜和暹罗(今泰国),但博医会宁缺毋滥的精英意识决定了《博医会报》的读者对象和发行范围有限,仅局限医学传教士内,确切地说,只能在博医会和教会医院的群体内赢得回应。如此狭隘的定位,且不论中国读者,甚至它难于将信息输送至在华的外国医生视野中。因而博医会创始者想通过《博医会报》创建医学传播和科学研究的平台,专注医学传播与交流的愿望要实现,还有实际的障碍。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博医会报》封面上“医学传教士”的标志赫然在目,不管编辑们多么不愿意,杂志的宗教印记还是深入人心。责任编辑杰福瑞斯曾举例说,一位在上海开业多年的西方医生,居然不知道《博医会报》,直到自

已给他看了杂志,才了解到它原本是专业杂志^①。1907年4月18日博医会年度会议在上海举行,杰福瑞斯提议更改杂志名称: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在华)仅有的一份优秀医学杂志,而不是一份传教士杂志。因为它的创建者从未想使其成为一份传教士的杂志。事实是,它确确实实是一份医学期刊,尽管其中杂有强烈的宗教和基督声音,主动而积极地宣传医学传教。但它更想成为一份医学专业杂志,而不是传教士的宣传册。^②

他解释说杂志中刊载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却很少被海外专业医学期刊所引用,就因为名称中有“传教士”的字样,让一般人以为是一份传教杂志而非医学期刊,国际专业医学期刊的编辑是不会考虑转载此类杂志上的文章的。杰夫瑞斯认为有必要拿掉“传教士”一词^③。他的建议获得文恒理和汉口代表的支持,也有会员担心更名会改变杂志的属性^④。最终,杰福瑞斯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杂志以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命名,注明由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出版^⑤。大会通过了他的这项提议,即将卸任的博医会会长在更名声明中表示,名称的变更并不意味着杂志性质的变化^⑥。只是现实终究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新晋会长师图尔(G. A. Stuart, 1859 - 1911, 在1907年的大会上当选)就清楚地看到杂志更名后的发展前景,指出它必然会产生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广东医生相信更名后的杂志将找到引领他们走向科学世界的道路^⑦。1907年5月第20卷第3期的杂志名称改为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完成其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

有关这本杂志的名称,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即本刊的中文名称。1907年前该杂志并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称,第一期中有两种说法,一是“行医公

① “Editorial”,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CMJ)*, Vol. XXI No. 3 (May 1907), p. 130.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p. 132.

⑤ Ibid., p. 131.

⑥ “Conference Report”, *CMJ*, Vol. XXI No. 3 (May 1907), p. 153.

⑦ Ibid.

报”,另一种是“医学新报”^①。但这两个名称均未见于杂志封面,显然是非正式的。之后,未再见到任何中文名称和中文稿子。直到20年后,在1907年的大会上,与刊物更名同时提上议程的,就是设计学会和杂志的中文名称。当时,会员们提出多种称呼,最后经名词会委员高似兰(Philip B. Cousland, 1860-1930)领导的翻译小组反复讨论后,建议采纳“博医会”和“博医会报”^②。

1907年5月第20卷第3期,这份英文刊物才有正式的中文名称“博医会报”。

二、使命:医学传教及其定位的再思考

1833年12月6日裨治文再次致信美部会,明确要派一名眼科和皮肤科的医生来华,“当他治好病人,让盲人重见光明时,他会发现有机会向人们散发宗教书籍”^③。近世来华的医学传教士往往会首选眼科作为医院主业,因为“让盲人重见光明”既可在医疗上产生奇迹般的效应,又可作为基督上帝为中国人民带来光明的隐喻^④。但是正如盲人是靠摸索前行的,医学传教在中国选择怎样的路径展开,同样需要摸索一段时间。由商人、医生和传教士共同组成的“在华医务传道会”成立

① 由颜永京翻译的这篇“中国行医传教会启”中,提到本刊为《行医公报》,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41; 在吴虹玉撰写的“医道可辅传道说”,称为《医学新报》,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44。为行文统一,本文一律采用《博医会报》和博医会的称呼,包括论述1887年至1907年这段历史。

② “Our Chinese Name”, *CMJ*, Vol. XXI No. 4 (July 1907), p. 221。有必要说明的是,“博医会”是其正式的中文名称。1911年之后,在博医会出版的书籍上,会标上“中国博医会出版”的字样。但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华博医会”的称呼。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归主》,是由1922年出版的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翻译而来,其中将英文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博医会) 译为“中华博医会”,一字之差缘起于此。1932年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合并,英文名称改为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博医会的历史就此终结。——“本会消息中华医学会博医会执委员联席会议”,《中华医学杂志》,1932年第18卷第3期,页509。

③ “Elijah C. Bridgman to Rufus Anderson”, Canton, Dec. 26, 1833。美部会档案,卷256,转引自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93。

④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37。

不久,便因利益与意见的不统一而出现分裂便是明证^①。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与经验积累,至1887年,在华医学传教士已从60年代的20余人达到近200人,医疗场所遍及全国45处^②。医学传教的工作内容和路径已经很清晰,建立诊所救治疾患(heal the sick),培养中国医科学生,医学传教士在工作之余再翻译医学书籍传播科学知识,传教工作则留给医院里的神职人员^③。因而,当医学传教士重新聚集在一起创建博医会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比“在华医务传道会”成立之初要成熟得多。

只是,在医学传教士成长发展的50余年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冲击下正在一步步地发生改变,基督教在华传教氛围亦在逐日改善,尤其是在条约的保护下^④,传教工作的障碍基本扫除,原先依靠医生疏通传教道路的需求已不复存在。19世纪80年代起,医学传教士是否还有存在价值的疑问在各差会弥散开来,传教团中有人对“医学传教”的媒介作用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它已不具备武器的价值,而医学传教士亦对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前途产生疑惑^⑤。医学传教是他们的使命,还是工作中的包袱?这是博医会成立之初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摆正传教在医学工作中的位置,是博医会必须重新思考问题。《博医会报》创建得正逢其时,它为医学传教士们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讨论平台,可以让他们直言不讳地探讨,诸如“在医学传教中的福音”定位问题^⑥和“教会医院的宗教工作”^⑦。

会长嘉约翰介绍该刊的主旨是最大程度展示医学传教士的价值,然后才是医

①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页311。1845年在华医务传道会分裂为香港与广东两个学会,广东会一直延续至20世纪,学会出版*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Reports*,报告两会在香港和广州的教会医学进展。

② “List of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Core and Siam”, *CMMJ*, Vol. III No. 1 (March 1889), pp. 26-29

③ H. W. Boone,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ts Future Work”,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5.

④ 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和1859年8月16日《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和新教可自由在内地传教、建教堂和医馆。

⑤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页93-109。

⑥ J. Menneth Mackenzie, “The Evangelistic Side of a Medical Mission”,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5.

⑦ Mildred Philips, “The Religious Work of Mission Hospitals”, *CMMJ*, Vol. III No. 3 (September 1889), pp. 92-94.

学专业。“奉献我们的精力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打开盲人的眼睛,去看去接受我们展示给他们的上帝的真理”^①。嘉约翰对医学传教的态度决定了《博医会报》最初的编辑风格,早期的刊物中医学传教的内容会占到一定的篇幅。作为博医会的同仁刊物,在报告医学传教事业动态的同时,杂志主编亦会不定期地主持邀请传教士就医学传教中的敏感问题展开讨论。马根济对医学传教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分析医生为何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于“福音”事业:

一、他是影响病人的最佳人选;二、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助手会信奉上帝;三、除非他参与这项事业,否则作为传播中介的医学传教将难以得到发展与进步;四、他的精神世界需要上帝。^②

在第2卷第2期中,他进一步探讨了医学工作中的精神因素^③。1888年,嘉约翰再次就医学传教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推动医学传教士去思考为什么医院不能让病人皈依。他以为一个伟大医生的使命是通过一个词或一次触摸,证明他的力量能治愈灵魂的疾病^④。但形势似乎对医学传教士不利,1890年在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会有传教士作了《传教士方法的历史回顾》的报告,评估传教士所采纳的各种方式,希冀能寻求令人满意的手段以推进工作,但其中只字不提医学传教的方法和医学传教士对此行业的贡献^⑤。博医会代表稻惟德以《作为福音中介的医学工作》一文予以回答,开宗明义地表示医学传教在各类传教方式中是令人满意的最佳道路,并获得最大的成果,他反过来质问教会与教堂是否充分利用医院所创造的机会^⑥。但稻惟德无法列出具体数据证明医学传教的成功。

长期以来,教会医院的情况由医学传教士个人撰写报告,提交各自的差会,出版医院报告。《博医会报》出版之前,教会医院报告和医生的临床研究一般载于

① J. G. K. , “Introductory”,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p. 29 – 30.

② J. Menneth Mackenzie, “The Evangelistic Side of a Medical Mission”. *CMMJ*, Vol. I No. 1 (March 1887), p. 7.

③ J. Menneth Mackenzie, “Some Spiritual Results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CMMJ*, Vol. II No. 1 (March 1887), pp. 16 – 20.

④ J. K. Kerr, “Medical Missions”, *CMMJ*, Vol. II No. 4 (December 1888), pp. 151 – 152.

⑤ John L. Nevius, “Historical Review of Missionary Methods-Past and Present-in China, and How Far Satisfactory”, *Record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167 – 177.

⑥ A. W. Douthwaite, “Medical Work as an Evangelizing Agency”, *Record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 pp. 268 – 279.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教务杂志》《海关医报》(*The Custom's Medical Report*)《中国评论》《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等英文媒体。《博医会报》出版后,《教务杂志》称其为“基督教海外第一份医学杂志”。并预言它在中国将广受欢迎,传教士亦可受益无穷^①。《博医会报》一经面世,各地教会医院的报告便接踵而来,于是从第2期起,《博医会报》增设一栏“医院报告”(Hospital Reports),选摘博医会成员提供的医院报告。内容包括就诊人数、手术案例和人数、疾病类型、医院的床位数、医院建筑与医疗设备、捐款数目和鸦片治疗等详细信息和数据。很快,《博医会报》的“医院报告”便取代了《教务杂志》上的专栏。两者相比较,可以发现双方编辑的倾向略有所不同,《博医会报》更偏向于陈述医院实际情况和记录真实数据,而《教务杂志》热衷于选摘医院中发生的治疗奇迹之类的事情,以迎合传教目的。报告中体现近代科学思想的疾病分类和繁琐的数据不仅可以见证教会医院的工作成效,亦能为散布在全国各地,波及日本、朝鲜及海外的医学传教士创造经验交流的机会,分享各自处理困境的方法与手段。医学传教士报告中必然涉及的一项内容是医院所展开的福音工作,编辑有意识地挑选一些在医院福音工作有所成效的内容发表,也摘取某些医生无可奈何的表态,“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来看医院的工作,总是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从未放弃在病人中传播基督的真理”^②。“医院报告”中随处可见医学传教士为不能吸引更多病人进入教堂而进行自我辩护的记录,比如汕头医院报告说:“必须注意的是,一些皈依上帝的信徒,他们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在医院里。”^③但教会医院能够提供病人皈依的数据实在太少了,难以获得传教团的信任。毕竟对只有百年历史而言的海外传教团,“医学传教”还是一项新事物^④,无论是传教团还是医学传教士都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和经验。值得庆幸的是,西方人自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确定双方的职责和做事原则。1891年《博医会报》组织一个小型研讨会寻求对应策略,杂志刊登6位博医会员的讨论稿^⑤,霍奇对教会轻视医学传教价值和教会医院的功绩颇为不满,

① “The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II No. 4 (April 1887), p. 164.

② “Hospital Reports”, *CMMJ*, Vol. II No. 3 (September 1888), p. 145.

③ Ibid.

④ S. R. Hodge, “The Church's Duty in Relation to Medical Missions, and the Principle upon which Such Miss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CMMJ*, Vol. V No. 3 (December 1891), p. 137.

⑤ Ibid., pp. 137 - 158.

他甚至抱怨教会只将教会医院和医学传教士当做廉价的工具使用,不提供经济支援,却还要以皈依人数来考核羞辱他们,他以为医学传教士必须认清自己首要而且重要的职责是治愈病人的身体,这样才能赢得尊重。他赞赏《博医会报》的做法,留出版面给医学传教士,撰稿教导、启蒙并唤醒教会对医学传教的重视,他告诫教会,明确自己的职责是尊重知识、才智和财富。在此前提下,才能确立医学传教的原则:1. 奉献最好的“治疗的礼物”——人才(合格的医生和医学生)、护士、舒适(医院的设施)和医疗设备;2. 奉献免费的礼物(免费医疗);3. 医学传教工作要集中在一个设备良好的医院里,并有一位合格职员来管理;4. 同一个城市中若有两三家差会,可联合起来创建一所设备完善、人员优秀的医院^①。霍奇的立场十分明确,基本代表当时博医会成员的态度。当然有些传教士的表述会相对温和些,以为“医学传教”虽不代表耶稣的治愈力,但西方医学的诊疗活动是结合了基督教慈善精神的^②。也有医生提出在上海建立无宗派的医学传教大学,用英语教学,开设诱人的课程,将医学传教事业发扬光大,预言不久便会硕果累累^③。

壮大医学传教事业,使之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医学传教士在多年实践基础上,面对新问题再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成为医学传教的新使命。每期“医院报告”都不会遗漏的一项内容,是教会医院中国医学生的教育报告和毕业人数,或许能证实博医会的态度和倾向,医学传教士们尝试以实际行动开始他们从医学传教向医学传播的转型。但前行的征途与世纪初开创医学传教道路一样的艰难,不同的是当初的阻力来自中国社会,而现在是源自差会的反对和医学传教士内心的犹豫,是传播福音还是传播医学?双方的较量在《博医会报》上显露端倪。1893年《博医会报》连续发表多篇关于信仰与救治、医学传教的文章,1894年一反常态,全年未刊登一篇与传教相关的文章,1895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取消“医院报告”,改为“福音”栏目,刊发《从黑暗到光明》^④《医院病人的福音之旅》^⑤《两姐妹的故事》^⑥等长

① S. R. Hodge, “The Church’s Duty in Relation to Medical Missions, and the Principle upon which Such Miss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CMMJ*, Vol. V No. 3 (December 1891), pp. 137 – 144.

② The Rev. Ernst Faber, Dr. Theol, *CMMJ*, Vol. V No. 3 (December 1891), p. 151.

③ F. C. Roberts, *CMMJ*, Vol. V No. 3 (December 1891), p. 153.

④ H. Parry, “From Darkness to Light”, *CMMJ*, Vol. IX No. 1 (March 1895), pp. 22 – 23.

⑤ “An Evangelistic Tour amongst former Hospital Patients”, *CMMJ*, Vol. IX No. 2 (June 1895), pp. 81 – 87.

⑥ “A Tale of Two Sisters”, *CMMJ*, Vol. IX No. 3 (September 1895), pp. 159 – 160.